

文革博物馆专集（二十）

印红标先生的书房兼做儿子的卧室，陈设非常简单，电话机放在一张旧方凳上。醒目的是书柜上面几层排着的国内、海外关于文革的书籍。下面紧闭的柜门里，塞着原版、复印的文革资料。这些资料，是他前些年花了上千元搜集的，“现在买不起，潘家园旧货市场上，一部林彪的讲话集就涨到了300块。”

对那场整整30年前发生在中国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虽然许多中国人已不愿提及，许多中国人无暇提及，但也有几十位如印先生这样的中国学者，在专心致志、乐此不疲地进行着学术研究。

他们不愿意这段曾称为“浩劫”的历史被渐渐遗忘。已经有北京大学党史专业的研究生说，本科老师对文革的讲述很原则，很含糊，很简单，很回避；清华大学的学生问老师：造反派为什么要拆长城（文革中有“毁我长城”一说，指冲击解放军）？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质问：文革的苦难是不是被知识分子夸大了？我爸妈也是“老三届”，就从未听他们说过那么多苦！还有大学生提出：中国人对文革的评价会不会像法国人对待法国大革命，将出现很多反复？……

40多岁的印红标举了两个例子：小时候曾对“地主”有一固定漫画式概念，后来下乡，才发现真正的地主和概念中的不一样；日本许多年轻人对“二战”的概念非常模糊，甚至弄不清日本到底是侵略方还是受害方。印先生不希望他的孩子这一代对“文革”这个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也那样糊涂无知，更不愿悲剧重演。

愿望虽好，但要真正在“文革学”上有建树、在学术水准上拔头筹，对国内这些学者并不容易，首先便须面对两支劲旅的挑战：先行一步的国外文革学研究者，以及异军突起的海外中国学人。

## ☆ 三军实力各有千秋

研究“文革学”的洋人以美国最多，无论资料与学术水准，都堪称海外文革研究的中心。这些美国人几乎在文革一开始，即以极大兴趣投入了研究。美籍华裔学者李鸿永在一九七八年即出版了有关广州文革的专著，其研究的深入与细致，连国内的学者也为之折服。七十年代，南加州大学的罗森为了撰写《广州红卫兵的派性与文革》，采访了一千个当时到香港的广州人，掌握的数据包括各种家庭出身的学生在红卫兵中的比例。美籍华裔学者陈佩华通过个案调查收集口述材料，撰写了另一部红卫兵研究专著——《毛的孩子们》。但也有学者提出，从七十年代在台湾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美国学者，到八十年代研究文革学的美国学者，或者都在其国防型研究——寻找中国百年历史变迁规律的范畴之内。

多学科的研究与多学派的争鸣，是三十年来海外文革学研究的主要特色。研究资金的充沛，也为资料的收集提供了充分的保障；资料的充分交流又推动了研究的发展。研究的领域从偏重于上层政治斗争扩大到社会学、历史学乃至文化学。虽然始终不乏由于意识形态而陷于偏执者，但在激烈的学术争论中，不能保持客观、缺乏学术见地者逐渐被淘汰出局。与此同时，一些政治学者、社会学者则因研究中国文革而成名。他们的一些研究成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哈佛大学麦克法夸尔主编的《剑桥中国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2：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被中国三个出版社以三种译本出版，每一种都十分畅销。

欧洲的英国、法国、瑞典，以及澳大利亚等国，也都有潜心研究文革学的学者，但有成就的学者似乎都与美国有着或资料或合作的某种联系。有趣的是，许多当年的左派汉学家始终对文革保持着兴趣，而他们当中极少文革研究专家。

相形之下，在中国研究文革学的，几乎都亲身经历过文革。他们包括：专门从事党史研究的工作者；文革中受过打击、不愿悲剧重演的老年学者或学者型领导干部；在文革中有观察、有感受、视认识文革现象的本质为精神追求的中年学者；以及在科研、教学中涉及到文革这段历史而进入这一领域的学者。中年学者是目前国内研究的主力。他们对文革有完整的个人体验，许多资料中的欠缺，很容易凭记忆

忆、推论去丰富；然而在学术上，这也便成了他们的弱点——每一位学者在文革中的经历，都可能影响到他们对文革研究的客观性。与海外学者相对的冷静、客观不同，他们一不留神，就可能在研究带上感情色彩。

不过，也正是这样那样的个人经历，让这些学者始终对文革保持着浓厚的学术兴趣。他们中的多数人虽然身为学者，但文革学研究基本上是“副业”，收集资料、做研究的时间与经费，差不多都要自己筹划。好在有“新中国史”、“新中国文学史”等等“主业”，为他们提供生活与工作的基本条件。

国内的文革学研究者中，也有文革出生的年轻一代。文革的一切对于他们，近似于红军长征穿的稻草鞋，八路抗日用的“三八”枪。与海外文革学的新一代一样，他们在学术上还没有形成特点。保持理性的研究，可能成为他们最大的特点。

海外从事文革学研究的中国人，在九十年代异军突起。他们多是从中国大陆赴欧美留学的，其中有些人的研究已在国内水准之上，以中英文出版了武汉文革史的王绍光，即为国内学者所称道。现任澳大利亚国家科学院院士的杨曦光是个文革中极端激进的中学生，他在监狱里向右派狱友学习英语和数学，文革后赴美攻读经济学、现在成了一个保守派经济学家。他所进行的文革研究，一直对澳大利亚的学者有着深刻的影响。

无论如何，海外中国学人有得天独厚的学术优势——既可以回国做实地调查，又享有国外方便调阅的文革资料，始终令国内同行艳羡。国内的学者也承认，他们的眼界可能更开阔，他们在理论与思想方法上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问题，丰富了中国文革学研究。然而，他们也可能已经或将要成为外国人。

## ☆ 文革学在中国含苞欲放

国内的文革学研究在进入九十年代后有了新的突破，社会层面与文化层面的研究逐渐开始活跃，深入的理论思考使这项研究更具有学术性。

在此之前，中国人对文革的认知最初是渗透在“伤痕文学”之类小说中，此后的出版物是各种有关文革人物的纪实文学，在这些文学化的文革记叙中，不乏歪曲、杜撰之笔。

1986年，由于学者的正式进入，一般认为文革学从此开始的一个新阶段。这一年出版的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虽然反应强烈，但其中史料的错讹、理论的缺陷也是十分明显的。1988年，国防大学从事中国革命史研究的王年一教授出版了《大动乱的年代》。这部书由于有详实的资料、严谨的分析与更深入的思考支持，不断再版，直到原版不能再印。这部书的英译本去年译完，即将在海外出版。新近出版的《“文化大革命”史稿》一书的中共中央党校金春明教授，即成为中国第一也是唯一指导“中共党史专业文革方向”的博士生导师。

九十年代国内文革学研究的最大特色，是在对重大事件、上层人物关注的同时，注意到对于文革的普通参与者——红卫兵、工人、知识分子以及文化问题的深入研究。

上海有学者写出了“上海工总司”的历史；有学者在专题研究文革中四川的正式工与临时工；北京也有学者在分析文革中的知识分子。他们希望在学术上探究诸如“群众为什么会参加到文革中去”、“红卫兵的激情从何而来”、“这种激情和大炼钢铁、声讨右派的激情有何不同”之类导致文革的社会以及思想根源。

虽然此类涉及当时社会问题的研究比国外慢了一步，但国内学者自信有实力拿出更高水准的研究成果，形成有中国特点的文革学派，并成为文革学研究的主流。

实际上，在文化层面，国内学者已然做出了一些外国人基本做不了的研究成果，研究领域也正在拓宽。中央戏剧学院讲授新中国文学的杨健副教授在1993年出版了《文化大革命中的地下文学》一书，将中国现代诗的源头溯至文革中的“白洋淀诗群”；研究新中国美术史的学者们第一次将文革中的美术问题列为研究对象，并且还在研究中出现了激烈的争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为近年文革研究中一个热点；两个有知青经历的历史学者何岚、史为民出版了学术著作《漠南情》，以大量资料与考证记录了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的知青史；一本上山下乡运动史今年也将出版。

此外，还有学者在文化学领域探究文革中的崇拜现象；有学者提出在思想史领域“寻找失踪者”——他们想知道，文革后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是否都能文革中的思考者里面找到其先河；经济史学界也有人开始关注中国文革中特殊的经济现象。

九十年代以来，有关文革题材的纪实文学大量出版，可视为学界之外的一种研究。例如，叶永烈的《蓝萍外传》等“四人帮传记系列”，林青山关于林彪、康生的两部“外传”、张云生的《毛家湾纪实》，梁晓声的《一个红卫兵的自白》以及冯骥才的《一百个人的十年》等。虽然某些作品因不乏演义成份而遭学界诟病，学者们也不敢在研究中引用，但由于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一般都进行了大量的调查，作品中披露的大量事实、作品所反映的人文心态，仍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参照材料。《一百个人的十年》在内容的可信性方面即得到学者的赞赏。

## ☆ 学者的困顿

社会科学理论功力的不足，是目前国内文革学研究明显的缺陷。但中国资料资源的丰富，却是国外学者所难以匹敌的。外国学者尽管在资料搜集上下了很大功夫，但远不如中国保存得多。一个外国学者可以通过东欧国家驻华使团、西方国家驻京记者以及出入境的华人，搜集的北京、广州、拉萨三地相当齐全的红卫兵小报；而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则藏有全国各省几十个城市文革小报。

不过，由于大批资料和档案尚未开放，国内许多潜在优势并未得到发挥。一些学者不得不通过国外的图书馆“返销”中国的文革资料。

哈佛大学的费正清东亚中心资料室，据说是国外收集文革资料最全的地方。其收藏包括许多文革时家喻户晓、或曾经满街张贴、但目前在中国未予公开调阅的文献。这个资料室的负责人南茜小姐几乎每年都到中国来，为该中心充实新的资料。

经过二十年的“烹炒煎炸”，外国学者几乎已用尽手头的文革资料，新的资料又一时难以发现；很多以文革学起家的著名学者另起炉灶，转向研究中国新的现实；相应的研究经费也随之而去；历史学家们又不可能及时来填补空白——国内的学者因而希望：他们终于有了一个迎头赶上的机会。

目前，国内学者对文革学的研究成果多以论文形式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但近十年尚无论文结集出版。由于各种原因，有关文革的学术著作及工具书的出版也有相当困难。一些学者抱怨文学化的、甚至编造的文革故事充斥书摊，而带注释的、严肃的文革学术著作却鲜有出版。有关文革的工具书，国内出版的似只有《文革期间的怪事怪语》；有一部数十位学者参与编纂的大型《文革辞典》，按“人物”、“事件”、“专用语”等分类，据说相当详尽，诸如“支左”、“斗批改”一类后

人可能莫名其妙的词汇，都有500—1000字的说明；但成稿多年尚未出版。

时下，倒是有“文化沙漠”之称的香港，出现了一股小小的“文革出版热”。随着文革结束20周年的临近，香港的学术期刊纷纷向内地学者约稿。香港中文大学的《21世纪》杂志去年出了两期文革专辑，一半以上的文稿来自内地学者，而且一般都署作者本名。香港学界似有自己的原则，肯定文革的文章，一概拒绝刊登。

香港出版界一直在出有关文革的书，现在更是跃跃欲试。香港虽然几乎没有研究文革的学者，但有一大批关心文革的学者与读者，怕也是文革书走俏的原因。据了解，一个文革研究的国际学术会议，也计划今年在香港举行。有学者预测，随着“九七”的临近及至“九七”之后，香港的“文革出版热”有可能继续热下去。

国内文革研究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国内学者缺少学术交流，迄今尚未召开过以文革研究为主题的大型学术研讨会。学者之间向少沟通，缺乏信任。一些文革事件的当事人，也信任洋人胜于国人，令国内学者的研究徒增难度。

目前，中国研究文革的学者尚无交流切磋的学术团体。但许多学者开始关注其他人的研究，通过阅读其学术论文，渐渐由神交到相知，彼此开始建立信任。有的虽互为学术上强劲的竞争对手，仍愿意通过电话、书信探讨同时在研究的课题。个别学者有机会参加国外关于文革的学术讨论会；但几乎都是出国时“就便”出席。国内外学者的交流，多为外国学者访华。至于合作研究，虽然具有优势互补的特性，但很少实行；“你有新的材料？我们合作吧！”国外学者常常这样表达他们的合作意向，令经费匮乏的中国学者感到尴尬。

对于中国的文革学者，最大的困顿还在于普通中国人对于文革的健忘和逐渐冷漠。印红标先生道出了他的困惑：我们的研究是为了避免悲剧的重演，但有时也会不由地问自己：这段历史也许还是忘了更好？越是深入研究，越发觉文革的复杂；政治层面与社会层面问题的交错，使许多事物具有多重性。每一个文革过来人都可能控诉自己受到的伤害，那么谁是施害者呢？而即使是最普通的中学生，都可能既留下自己的精神伤疤，又曾经有意无意地伤害过别人；结果“似乎人人都不太光彩”，整个民族都有责任。“是不是这个反省太痛苦，还是一笔勾销，大家都不提为好？”连他在国外作学术报告时，都有“家丑外扬”的顾虑，生怕不小心伤到自己的民族自尊心。

话虽如此，这位寂寞的书生至今仍和他的同道一样，在自己的书斋里培育着他所期待的文革学花朵。

□ 原载《华声月报》1996年3月号

∞ ∞ ∞ ∞ ∞ ∞ ∞ ∞ ∞ ∞

《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后记

• 宋永毅 •

一九三六年的春寒陡峭之中，当鲁迅为被杀害青年诗人殷夫的诗集《孩儿塔》作序时，写下了这样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字：“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受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白莽作《孩儿塔》序）。岁月如流水，早已漂白了当年的血迹，但当我在编纂这本《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时，却刻刻反刍着当年那种由激情与痛楚酿成的躁动不安的心境。这种共鸣自然发端于相似的史实；在这本文革中异端思潮的集子里，也有着我相识或不相识的亡友的遗文，他们与当年的殷夫同样年轻、狂热、虔诚、富于献身

精神。只不过事过境迁，物换星移，在鲁迅作这一序时，青年殷夫们所信仰、所引进的共产主义革命理论，曾是二十世纪最大的异端思潮。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三十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它已经由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演变成了一种绝对正统的意识形态。而这本集子里的所有文字，却恰恰是颠覆与反叛这种共产主义正统的另一种异端。或许，如同历史上任何一种端倪初露的异端思潮那样，迎接先驱者的决不是鲜花和美酒，而是牢房和子弹……。如果广泛而言之地论及这本集子里的文字所代表的一代人的觉醒，反窥这些今天看来已十分浅显的真理，而这一代人却倾注了他们的全部执着与希望，并在历史祭坛上付出了“乾坤特重我头轻”（遇罗克）的代价，更令人觉得“寝食不安”地要把这些文字“流布”出来。

这本集子的雏形，成于年湮代远的一九六八年的夏秋之交，时值红卫兵运动被它的发动者赶下历史舞台，流放到广阔天地去接受再教育（插队落户）之际。当时，上海市最著名的重点中学——上海中学的一批已有反叛思想的造反红卫兵决定编辑一本名叫《思潮集》的油印文集，作为赠送给所有上山下乡战友们的礼物。这本数百页的沉甸甸的文集中，收集了当时所能收集到的所有文化大革命中的“反动思潮”的文章：遇罗克的《出身论》，联动的“0 0 3 通告”，“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以及伊林·涤西《给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编辑这样一本异端思潮文集，出自于这批年青人这样一种共识：因“四大民主”而“解放”于文化大革命中林林总总的“反动思潮”虽然被镇压下去了，但作为一种思想，并没有被斩尽杀绝。在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社会思想斗争中，必然又会以新的、更为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因为它们所代表的社会矛盾并没有变化。因此，有幸或不幸成熟于这场大革命中的我们，必须从今天起，就学习与研究这些异端思潮。三十年后重新审视当年对“思潮斗争”的预测，仍微微惊叹于当时只有十六七岁的我们对中国社会竟已有了并不幼稚的洞悉。例如，今天的人们仍相当普遍地把人民群众与“太子党”矛盾比作“出身论”与“血统论”斗争的继续。而兴盛于八十年代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更是直接以李一哲们倡导“民主与法制”为其进军大纛的。当年参加《思潮集》编印工作的伙伴们除我外还先后有曾小逸、陈兼、郭秀君、张昭卿、戚成炯、闻震威、高哲民、许子明等，其中许子明因“四人帮”的迫害，已在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祭上了他仅二十三岁的生命……。

如同我在这本书“总论”中第三部分《反论：异端思潮成熟在文化大革命中》里所阐释的，一九六八年后的中国青年运动的走向已由狂热的革命造反转换成冷静的“地下读书”和自觉半自觉的“社会调查”。而一九六九年后中共中央所发动的“清理阶级队伍”（一九六八至一九六九），“一打三反”（一九七零），“清查五·一六”（一九七一）等镇压民众的运动，正是把这一代觉醒中的青年人作为“异端”和他们的主要打击目标之一的。上述编印《思潮集》的伙伴们，都曾经受到过程度不同的迫害。《思潮集》的编印还曾经被上海中学工宣队专案小组作为一个疑案来进行清查。我个人的命运可能更不幸一点：一九七零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我因组织“地下读书会”而被审查；一九七一年的“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又作为“反革命”身陷囹圄近四年；直到“四人帮”粉碎后的一九七八年才作为“纯属反‘四人帮’”平反。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正因为我自己当年也曾是文革中成熟的异端思潮的一份子，更感到时时“捏着一团火”，要把这本异端思潮文集编纂出来。

幸运的是，尽管文革后期政治迫害中的多次抄家和中共中央对文革非官方材料强令收缴，这本《思潮集》仍被我的一个朋友精心保存下来。一九八九年我赴美留学时毅然把它藏匿于箱茭之中，带到了大洋彼岸。自然，我当时就怀着一个在将来的某一天以此为基点编纂一本文化大革命中的异端思潮文集的“美国梦”。经历了六年的异域学海浮沉，我有幸在去年任职于美国匹兹堡大学东亚图书馆和东亚研究中心，重新开始我的研究生涯。怀着一种几近于神圣的使命感，我开始编辑这本《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的文稿。

尽管三十年前的《思潮集》中的数十篇异端思潮的文章已为本书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蓝本，但要顾及文化大革命中全国的异端思潮，其代表性与典型性还是不够的。例如，武汉“北、决、扬”这样的“新思潮”代表流派，《思潮集》仅收有一篇《北斗星学会宣言》。为此，我只能向海内外的文革研究者广泛求援，并得到了他们热诚的帮助。美国耶鲁大学王绍光教授首先捐赠给我他全部关于“北决扬”的个人收藏。明尼苏达州立学院的丁抒教授，柏克莱加大张国良先生，澳洲莫纳大学杨小凯（曦光）教授，国内清华大学唐少杰教授，北京大学印红标教授，社科院哲学所徐友渔教授等都无私地捐献出他们的个人文革收藏，才使出版这本较为完整的异端思潮集的梦想成为一种实实在在的可能。杨曦光、王绍光两兄——一个作为当年“新思潮”的杰出代表者，另一个作为今日著名的文革研究者——欣然为本书作了热情洋溢的序，更为这项源起于一个十分冷酷年代的工程抹上一丝情与理的暖色。

照理，到本书公开出版为止，一个渊源于少年时代的“异端梦”应当告一段落了。我却仍然无法写下一个嘎然而止、余韵幽远的尾声。我蓦然间看到了自己已秋的霜鬓；当年亲历文革的十六七岁少年，今天已过了不惑之年——三十年的岁月足以稀释最强健的记忆。一瞬间，我又联想到三十年来对文革的“彻底否定论”和至今在中国大陆作为学术禁区的“文革研究”以及那些“不准查阅”的任何一个图书馆的文革材料和永远锁在各级档案馆沉重的保险柜里的“中央机密”。我在突然中洞悉了当权者们“彻底否定文革”的底蕴：他们要人民遗忘，在歌舞升平中遗忘他们在血与火中已获得的历史启悟与真知。一丝透底的悲凉袭上我的心头：我们这一代人、我们这个民族是否能抗拒这种难以抗拒的遗忘呢？

□ 原载《北京之春》第45期

∞ ∞ ∞ ∞ ∞ ∞ ∞ ∞ ∞ ∞  
结 束 文 革  
• 冯骥才 •

今年（1996年），我们面对着两个纪念日：一个是文革发端的三十周年，一个是文革崩溃的二十周年。这两个纪念日给我们的感受迥然不同。前一个有如死亡，沉重、压抑、苦涩，充满着哀悼的气息；后一个纪念日如同再生，然而它并不轻松。前一个纪念日是理性的、警觉的、反省和追究的；后一个纪念日则是情感的，但这又是一种百感交集。就是在这两个所纪念的日子之间，中国人走过一条比蜀道还要艰难百倍的心灵历程。

在这个日子里，我将文革受难者的心灵史——《一百个人的十年》最后的篇章完成，划上了终结的句号。这是一束带血的花，我把它放在曾经埋葬了一代人理想与幸福的文革坟墓上，并站在这冷冰冰的墓前沉默不语，耳朵里却响着我采访过的那些人如泣如诉的述说，这声音愈来愈响，顷刻变成那时代如潮水一般巨大而悲凉的轰鸣。

大约八年前，我说我要为普通中国人记载他们的文革经历，直到今日，大约有四千人通过写信和电话方式要求我成为他们的代言人。一个为人民代言的作家常常享受不到自我渲泄的快乐，却能感受到以天下为己任的高尚与庄严。在写作中，我一直遵循真实至高无上的原则，如今我深信自己完成了“记录文革”的使命。

无情的岁月表明，文革已是一个历史概念，但灾难性的历史从来就有两个含义，即：死去的历史和活着的历史。死去的历史徒具残骸而不能复生，活着的历史则遗害犹存。活着的历史属于现实，死去的历史才是一种永远的终结。但终结的方式，不是遮掩，不是忘却，不是佯装不知，而是冷静的反省与清明的思辨。只有在灾

难的句号化为一片良药时，我们才有权利说文革已然终结了。

本书附录了二十名非文革经历者——即1976年以后出生的人——对文革印象和看法的短语。它足以引起我们的警惕。悲剧总是在无知中反复，但不会在觉醒者中间重演。这也是我坚持要把这本书完成的深刻的缘故。

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我还要留出数页篇幅，以寻求一位忏悔者的自白。尽管我说过：“一个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我还说过“纯洁的人生从忏悔开始，丑恶的人生自负疚结束”；尽管我也倾听过一些良心难安的忏悔内容，但是我真正期望的那种不折不扣勇敢的忏悔者，还没有碰到。何日何时，一个被良心驱动的人来叩响我的门板？我想，只有这种时候到来，我才深信不疑良知与文明已经全然返回——无论是个人，还是整个社会。

当然，我不是责怪无辜的人民。歌德在谈起他的德国民族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想起德国人民，我常常不免黯然神伤。他们作为个人来说，个个可爱；作为整体来说，却又那么可怜。”我觉得我们中华民族恰恰相反，作为个人来说，人人都有弱点和缺陷；但作为整个中华民族却是那么可爱！

而文革，不仅调动了人性的弱点，如人的自私、贪欲、怯弱、妒嫉、虚荣，连人的优点，如忠诚、善良、纯朴、勇敢，也化为文革的力量。人性的两极都被利用，才是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然而，这样忠勇善良的人民，如果良性地发挥起来，会焕发多么宏大的创造力？这样的希望不是已经从今天的现实中看到了吗？因此，在终结文革的日子里，我们不是唤醒仇恨，展示悲苦，揪住历史的辫子去和一个政治的尸体较量，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清醒地面对过去，去从廓清的晨昏中，托出没有云田的属于明天的太阳来。

一句话，终结文革的方式，惟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

□ 写于《五一六通知》发表三十周年的深夜

※ 附：非文革经历者的文革概念 ※

方××（1976年出生，男，大学二年级学生）——

我喜欢历史，注意过文革的事。文革对我们连记忆也没有，所以只有理智地去想。没有任何感情的东西。没有恨和爱，只有好和不好。对文革，我个人认为它还是有积极的东西。如果文革不是那么凶，那么混乱，走向极端，左的东西也难失去统治地位。改革正好拣了文革的便宜。文革对中国历史还是有功的。当然这不是文革本来的意思。目的和结果正好相反。

赵××（1977年出生，男，工人）——

中国不会再发生文革，现在的人市场观念特重，为了钱人心都散了，谁也甭想把人们再号召起来，除非用钱才能把人吸引住。文革倒是注重精神，听说那时上上下下为了什么事，都感动得流泪，特真诚，真棒！如果说这些人为了私欲互相残害，我看不可能。还有就是样板戏比老京剧好看，也蛮感动人。如果说“彻底否定文革”，我看样板戏首先就不能否定。

张×（1977年出生，男，大学一年级学生）——

我对政治兴趣本来就不大，对文革更不关心，那都是上辈子的事了。我的文革印象大多是听长辈说的。文革对他们有很深的影响，对我们却没什么影响，跟我们



的生活更没有丝毫关系。如果叫我回到文革，我不反对，甚至很有兴趣。一是我觉得文革怎么可怕，二是可能会感觉很新鲜，我想切身感受一下。是的，我有兴趣。

柳××（1984年出生，女，小学五年级学生）——

我知道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和一个大坏蛋打仗的故事！

孙××（1976年出生，男，出租汽车司机）——

文革咱没见过，但比现在强！现在的人要多坏有多坏！您是工薪阶层，没钱去歌舞厅对吧！那儿，狂啦！天上飞的、草里蹦的、河里游的，有嘛吃嘛！就一样东西不吃——屎！那些三陪小姐，一晚上到好多家歌舞厅去赶场，我当然知道她们了，我拿车拉她们呀！她们就在我车里掏出小镜子抹口红。一晚上赚的钱比您半年赚得多，信吗？都是那些大款拿票子砍给她们的。您说文革中他们能这么狂？您说嘛？问我赚多少？一天一百块。您说嘛？文革时也算资本主义也得挨斗？那就斗呗！反正得先斗那些款爷们！只要斗他们就行，先杀杀他们的狂劲再说！

万×（1979年出生，女，高中二年级学生）——

目前，我们的历史课正讲文革，课本内容不具体，根本无法理解文革，我没兴趣，能应付考试就行了。听妈妈说，文革时社会很乱，好人遭陷害。我想，毛主席也没能力了，不然他怎么会管不了“四人帮”呢？妈妈还说，那时工人不上班，学生不上课，我想，文革也不错，不用再上课了，热热闹闹，批斗老师，多有意思！我们同学还说呢，怎么不文化大革命呢，那就不考试了。我听人说，文革把中国的发展推迟了一个世纪。我也不知这话是真是假，一个世纪是怎么算出来的？没法核对。

马×（1979年出生，女，高中二年级学生）——

文革给我的感觉是：很神秘又很复杂，有点恐怖又有点可笑。听说有人把毛主席像章做得和盘子一般大，不能戴，只能用铁丝挂在脖子上，这些人不是疯子吗？还有，我爸爸说他去北京见毛主席，是骑自行车去的，他怎么会这么傻呢？如果是我，见谁也不会骑自行车去呀——这叫我真是不能理解。是不是有点不正常，变态？我想多了解文革，不知从哪里去了解。

何××（1977年出生，女，大学一年级学生）——

那个时代有激情，人都很真诚，非常迷人！我想象不出文革具体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有点像五四运动？那时也游行、演讲、斗争，也分两派，也打人，但那是一种为了信仰的战斗呀！我喜欢这种生活，哪怕这真诚被欺骗了也心甘情愿，因为我是真的，现在无法生活得那样富于激情了。

刘××（1980年出生，男，高中一年级学生）——

我知道文革坏，我听家长讲的，但我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不反抗？我对爸爸说，他们凭什么拿你东西，凭什么打你，你为什么不打他呢？要是我就和他们拼了。如果再有文革我才不怕呢，我也“打砸抢”，把害我们家的人都收拾了。

田××（1979年出生，男，高中二年级学生）——

都说文革搞个人崇拜不好。我看挺不错。一句话那么多人响应，人心齐，能干大事情。现在缺的正是这种精神支柱，很少有人再说起民族、国家这类高尚的话。据说文革时干活拼命，下班自愿不回家，现在太看重钱了。可是我并不懂，为什么对文革好像有点回避呢？考历史时，老师说：“不考这块，甭准备了。”“这块”就是课本上文革的内容。家里的爷爷奶奶也常嘱咐我们对文革这些事：“千万少说！”

郭××（1977年出生，职工）——

你设想一下，假如把文革从历史上去掉，那么文革前的社会和文革后的改革时代能连在一起吗？这就说明了文革的重要。不要轻易否定一段历史。我没看见过文革，但现在人人都说那时候没有吸毒和嫖娼，是吗？所以说，历史不是 $1+1=2$ 也不是 $2-1=1$ 。文革中有好东西，甚至有很好的东西。

谢×（1978年出生，职校学生）——

文革的问题是政治关系超过一切关系，现在的问题是金钱关系超过一切关系；文革干活不计报酬，现在是不给报酬不干活；文革是“一句顶一万句”，现在是谁说了也不算。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从文革和现在各取一半，放在一起。

张×（1977年出生，男，职员）——

每个人对文革的说法都不一样，给我的印象很乱。有人说文革时生活很苦，大学毕业工资才五十多块钱，但又有人说那时的物价低，一斤肉不到一块钱；有人说文革时随便打人，社会混乱，也有人说那时官员清廉，治安很好；有人说毛主席犯了错误，可还有人说毛主席伟大，一声令下，全国闻风而动。我也不知谁说的对，形不成一个完整的样子。我曾经把这些话对一个经历过文革的人说过，他说这些话全对，我听了就更糊涂了。

于××（1978年出生，女，打工妹）——

在农村听说过文革，不多。庄稼人对政治没兴趣，没心思打听，不碍吃喝就行了。文革好像是反左吧！别的就不知道了，知道了也没用。

贾××（1977年出生，女，农民）——

文革就是斗坏人、斗地主呗！不过老地主们早死光了。现时下，人们有的做买卖，有的还雇人干活，不也成了地主！文革还革谁？以后大伙都有了钱，谁还会闹那种事。愈穷才愈革命呢！

竺×（1976年出生，女，大专二年级学生）——

长辈很少和我们谈文革，大概没有共同经历，也没有共同语言。对于文革，我认为毛主席的初衷是好的，他让知识分子下乡，想支援文化落后地区，但适得其反，耽误了很多人才。那时候，青年学生一腔热血，到祖国第一线，奋不顾身，这样做对国家好，可是失去了自我价值。文革对我们一代的影响是间接的，但还能感觉得到，比如人际关系复杂、相互不信任等等，这和文革时候相互揭发和诽谤有关。我认为文革坏处多于好处，我为自己生在现在感到庆幸。

□ 转载自 A C T [xlz@chem.lsa.umich.edu (Xiaolin Zhao)]

~~~~~  
【微观历史】 [nex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文革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 印红标 •

1966年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在校园里贴出大字报，攻击中共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和北京大学党委主要领导人宋硕、陆平、彭佩云。6月1日，毛泽东决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这张大字报，从而点燃了自下而上冲击领导的群众运动的烈火。毛泽东盛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它被公认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开始的标志。

这张大字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人人皆知的，但是关于它的产生经过，却长期存在着疑团，至今说法不一。在中国，最通常、最权威的说法是：这张大字报是由康生授意聂元梓等人写成的，“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康生一手策划”，欺骗了毛泽东。但是持这一说法的人没有提供可供学者考察分析的详细资料来源，有些人对此说表示怀疑。

为澄清问题，笔者翻阅有关的文字材料，收集了几位知情人的口述资料。在联名签署大字报的七个人当中，笔者收集了聂元梓的口述资料，并直接访问了其余六个人，还以通信方式询问了与此有关的1966年中共中央理论小组驻北京大学调查组成员张恩慈，得到了他的答覆。依据这些资料，特别是口述资料，笔者认为，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不是由康生授意，而是由聂元梓等人主动写成的。大字报得到了曹轶欧和康生的支持。康生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最后由毛泽东决定推向全国。本文将考订和介绍有关这张大字报的历史事实。

## 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北京大学的党内矛盾

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的七个署名者都是共产党员，均来自哲学系，其中聂元梓是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赵正义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其余五人除了杨克明刚刚调出哲学系外，均为该系教员。一个系的党组织领导人和党员为甚么要攻击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的领导？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讲到北京大学的党内矛盾。

文化大革命以前，北京大学哲学系党员内部、一部分党员与学校党委主要领导人之间存在着矛盾，这些最初并不十分严重的分歧和摩擦与政治运动相交织，逐渐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激化起来。关于这一点，虽然可能有不尽相同的评论，但是在历史事实方面没有重大的疑问。

1964年夏季至66年初，北京大学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或者“四清”）。运动经历了反覆，牵动了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的领导人，激化了北京大学的党内矛盾。

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4年夏季至同年底。这一时期，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为首的社教工作队，从政治上否定了北大党委的工作，断言北大党委的方向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方向，使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受到不公正的批判。在社教运动中，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带头指责学校党委书记陆平等人，一些青年教师按照左的错误观点，响应社教工作组的号召，积极批判校党委。校党委节节败退。北京大学党委的上级领导机关北京市委竭力保护北大党委，与社教工作队进行抗争，派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参加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派大学部办公室主任彭佩云到北京大学兼任党委副书记，帮助北京

大学党委抗拒以张磐石为首的社教工作队的进攻，但未能挽回局面。

在社教运动中，哲学系出现这样一批积极份子并非偶然。运动前，哲学系部分教员就与校领导关系紧张。究其原因，据说涉及到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校党委书记陆平对一批教员的“右倾错误”的批判，以及关于60年代初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的前任）工作作风的争论。1962年，这位深受陆平器重的党总支书记在哲学系党总支改选中落选。本文无意讨论其中的是非，只想指出党内矛盾的存在。

从1965年1月至66年1月是北大社教运动的第二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北京市委支持北大党委推翻了社教工作队的结论，扭转了北大社教运动的方向。

1964年底，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方针。1965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制定并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一方面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方面要求纠正前一阶段社教运动中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的偏差。在中共中央，邓小平和彭真取代刘少奇负责社教运动的领导工作。

中央指导方针以及人事的变化立即导致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转向。1965年1月，彭真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接着，北京市委帮助陆平推翻了社教工作队的结论。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此后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撤消张磐石的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的职务，全面改组工作队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接任队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任副队长，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戈华参加工作队领导小组。此后，张磐石受到批评，离开北大。北京市委又召开北大的干部和积极份子会议，统一认识，对追随原工作队方针的社教积极份子进行了批评。这次会议进行了大约半年，因其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所以被称作“国际饭店会议”。1966年1月，北京大学社教运动宣布结束。这时毛泽东已经发动了对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批判，北京市委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

北京大学前期社教运动的错误理应纠正，而聂元梓等人对于批评耿耿于怀，一直等待着为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翻案的机会。四个月之后，天翻地覆的变化到来了。

## 二、北京大学第一张大字报的产生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怎样产生的？它与康生有甚么关系？这是本文考察的重点。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并且正式决定发动文化大革命。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很快传达到了北京大学的干部和党员。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康生主持的中共中央理论小组派出以曹轶欧（康生的妻子）为首的调查组进驻北京大学。调查组的任务是调查北京大学的学术批判情况，实际目的是为整北京市委搜集资料，以及发动“左派”写批判文章。

根据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委员、法律系系主任的陈守一回忆，调查组的曹轶欧不止一次找他询问北京大学学术批判情况，并且说北京大学的学术批判有问题，鼓动陈守一“揭发”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和北京市委领导，但是被陈守一拒绝。

曹轶欧动员陈守一向校党委发难未成，而哲学系的几位中青年教师却感到政治

气候的变化，跃跃欲试了。文革开始以后，这些社教运动的左派，密切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时常聚在一起议论。“三家村”的落难和北京市委的危机令他们鼓舞。“三家村”的主要人物邓拓正是北大社教后期工作队领导人之一，对彭真、北京市委的否定意味着有可能对北大社教运动进行重新评价。

调查组进校不久，哲学系青年教员、社教后期受过批判的宋一秀、高云鹏找到调查组成员张恩慈，谈论北京大学的运动。张恩慈在社教运动时也是北大哲学系教员，运动前期的“左派”。运动结束以后，他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共中央马列学院工作，这次随调查组返回北大。张恩慈说，调查组到北大是为了调查学术批判情况。谈到北大的运动，他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有点死气沉沉，法律系组织师生整理古代平反冤狱的历史资料，埋头故纸堆，方向不对。谈到如何打开局面，张恩慈提议串联左派。而宋一秀、高云鹏说：“社教运动中的左派大多数被派到远郊区搞社教运动去了，很难串联，是否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之类的东西？”张恩慈也拿不准，没有积极肯定，也没有断然否定，只是说“你们如果写，也只能贴到党委办公室的门口”。意思是说，不能公开张贴。

在这前后，杨克明也见过张恩慈。杨克明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张恩慈的同事和朋友，社教运动前期的左派，刚刚从北大调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仍然住在北大宿舍。杨克明说打算写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申诉材料，请张恩慈递送中央。张恩慈表示，现在向中央递送材料的人很多，中央看不过来，递了也没有多大用处。杨克明打听有关政治运动的消息，张恩慈说彭真确实已经垮台，北京市委、《北京日报》社、教育部已经有大字报了。

在这以后，大约5月20日或者21日，哲学系的几位教员，杨克明、宋一秀、高云鹏、赵正义和夏剑豸相约议论形势。谈话间，聂元梓来访，也参加进来。几个人谈到中央的《五一六通知》精神、近来的报刊批判文章，认为社教运动后期北京市委、北大党委批判他们时所依据的观点，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左派整风”等等，正是中央《五一六通知》批驳的观点。北大党委陆平、彭佩云不久前传达的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报告，强调学校党组织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遵守纪律等，实际是压制运动，北京大学运动的方向违背了中央的精神。几个青年人提议写大字报，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聂元梓建议写社教运动问题，但是年轻一些的教员主张要写就写现实问题，写文化大革命。于是决定从宋硕报告入手，批判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

大字报由谁执笔？最初决定以赵正义的一篇现成批判稿为基础，由宋一秀改写。但是修改稿不理想，于是宋一秀重新起草，这是第二稿。接着，几人又用大约两个晚上讨论修改文稿。讨论中有人提议，问题应当提得更尖锐有力，锋芒应当更犀利，要仿照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的笔法，逐一驳斥对方观点。因而推杨克明再作修改。

5月24日晚，杨克明在北京大学24楼112号房间高云鹏的宿舍连夜赶写。他对文章作了很大修改，几乎是重写，完稿时已是25日凌晨三、四点钟。杨克明稍稍休息，天已大亮。他把稿件交给高云鹏，就去电工所上班了。这是第三稿。

5月25日上午，高云鹏、宋一秀、夏剑豸、赵正义和迟一步到达的聂元梓在北大25楼204号房间宋一秀的宿舍讨论杨克明的修改稿，集体推敲，边议边改，逐句定稿。其中依照聂元梓提议修改了最后一段，并且加上三句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毛泽东思想！保卫无产阶级专政！”这是最后的定稿，由高云鹏和夏剑豸各抄写成一份大字报。

大字报的标题是《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文

章通篇政治攻击，其内容早已是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全文见本刊 z k 9 6 0 5 b ——编注）。聂元梓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故第一个签名。接下来是宋一秀、夏剑勇。杨克明当时不在场，由高云鹏作主代签。讨论临近结束时，赵正义去哲学系办事，委托宋一秀代签。再往下是高云鹏。六个人签完名以后，宋一秀叫来哲学系青年教师李醒尘，说明情况。李醒尘欣然签上最后一个，即第七个名字。1966年5月25日下午两点左右，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贴出。

以上过程依据的是聂元梓以外的六个人的回忆。他们强调，大字报是他们响应中央《五一六通知》的精神所为，酝酿过程中向张恩慈打听消息，但是在贴大字报这一点上，没有得到明确的支持，更谈不上有人指使；实际上，大字报是由青年教师发起并执笔写成的，聂元梓是参加者，而不是中心人物，没有她的参加，大字报也会出台。张恩慈的回忆与这些教师的说法基本一致。

聂元梓的回忆也说大字报是杨克明等青年教员首先提议的。然而，她提出了一个其他人未曾涉及的关键性情节：大字报酝酿期间她见过康生的夫人、调查组组长曹轶欧，并且得到了曹轶欧的支持。

聂元梓说：杨克明提议写大字报，她觉得不错，但是考虑到要请示上级。与杨克明商议后，她通过张恩慈与曹轶欧取得联系。曹轶欧在调查组住地与她见面，当时还有杨克明、张恩慈和曹轶欧的一个秘书在场。聂元梓没有提大字报要写甚么，只是问：“能不能给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贴大字报？”曹轶欧说：“能。”又说，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是纲领性文件，只要符合通知的精神就行，要很好地学习《五一六通知》。聂元梓回忆说，她和杨克明听到曹轶欧的答覆后很高兴，回到学校又告诉了其他人，他们也很受鼓舞。

对于聂元梓所说面见曹轶欧一事，大字报的其他六位署名人以及张恩慈无一例外地说不知道。杨克明和张恩慈对聂元梓称会见时他们在座这一点，断然否定，并且表示气愤和无可奈何，他们说聂元梓在编造假话。

对于相互冲突的回忆，笔者认为：聂元梓完全凭空捏造的可能性不很大，而其余的人也没有必要在近三十年里串通一气，否定事实。比较大的可能性是：聂元梓见过曹轶欧，并且讨回一个“能”写大字报的“上级精神”，但是其他人没有参与，也不知情。聂元梓与其他当事人的回忆虽然存在矛盾之处，但是都说明大字报的发起和酝酿是北大教师自主进行的，而不是康生或其他人指使的。

### 三、毛泽东的决策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北京大学就出现了一千多张大字报，最初多为支持聂元梓的，但是维护校领导的大字报很快占了上风。以后几天，很多人指责聂元梓等人是反党的大阴谋家，是邓拓“三家村”的忠实卫士。

5月25日，大字报贴出后几小时，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来到北京大学。接着，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张彦、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先后到北京大学，重申中央关于运动中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的精神，传达了周恩来的补充指示，要求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内外有别。北大党委当夜紧急召开全校党员大会，传达中央和华北局领导的指示。领导人批评的着眼点是公开张贴大字报违背了“内外有别”的精神。李雪峰提出可以将大字报撕下来，或者用新的大字报将之覆盖起来。他们虽然没有反对贴大字报的形式，也没有评论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的内容，但这已经足以使大字报的作者陷入被动。

调查组的张恩慈在大饭厅看到大字报，才知道这些昔日的同事有这么一个举动。他知道事情非同小可，找到大字报的作者了解情况，索取了大字报的抄件。又一日，深感政治压力的杨克明问张恩慈：“我们写的大字报到底有没有问题？”很快，张恩慈打电话给杨克明，提出领他去见曹轶欧。两人来到西颐宾馆曹轶欧住处，曹轶欧看过大字报底稿以后表示，这张大字报没有什么不对。她询问了杨克明的年龄、工作，并对杨克明说这种事情要谨慎。大字报的底稿留了在曹轶欧处，是杨克明在5月25日早晨交给其他人讨论的那一份原件，上面有聂元梓和其他人修改的笔迹。

正当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遭到反击的时候，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情况。毛泽东在6月1日中午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求在电台广播，并且写了如下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当天下午四时，这个批示从杭州传达到康生、陈伯达手中。毛泽东还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康生找了王力、关锋和曹轶欧，向他们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要求他们按照毛泽东的精神写一篇评论员文章。

当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联播节目中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内容。6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全文见本刊zk9605b——编注）。这篇评论员文章的重要之处是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毛泽东的指示、他本人的思想高于党的组织纪律；号召人们打破原有纪律的约束，向任何反对毛泽东的人进攻，不论其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

两个月后，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同一天，毛泽东为这篇评论写了如下一段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从这两段文字不难看出毛泽东为甚么如此看重并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他要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超越正常组织机构、制度、纪律的约束，冲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解决以往运动及常规运动方式没有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毛泽东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讲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正是提供了毛泽东所期待的，从基层发动群众冲击“走资派”的样板，广播这张大字报就是向全国推广这种运动形式。事实表明，全国性自下而上冲击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群众运动狂潮，正是从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开端的。

#### 四、结 论

文化大革命中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涉及三部分人：聂元梓等北京大学的干部和教师、康生和他下属的曹轶欧等人以及毛泽东。

这张大字报是由聂元梓等人发起，而不是受人指使写成的。促使他们写大字报攻击北京大学领导的直接原因是：第一，在一系列政治运动，特别是在社教运动中被激化的北京大学党内矛盾。聂元梓等人在社教运动中因为左的错误被批判以后不

服气，力图翻案。当然，除此之外还有更广大的社会政治背景。

第二，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的号召。1966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已经传达到基层并且被广泛宣传。在敏感的文化教育界，不少左派已经酝酿行动，例如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的吴传启等人于5月23日贴出大字报，攻击学部领导人杨述。教育部也有人写了大字报。北京大学大字报是当时政治运动和思潮的产物，它在酝酿过程中也从调查组得到了信息和支持。

康生以及曹轶欧的作用主要有：第一，促进和支持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曹轶欧及其领导的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在大字报贴出前后对发起者表示了支持，这对促进大字报的出台和稳定作者们的信心至关重要。

第二，康生不失时机地向毛泽东呈报大字报的内容，对毛泽东及时了解大字报并进而决定支持大字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关于大字报的指示，最初也是通过康生传达的。

曹轶欧确实在北大发动陈守一批判党委，但是没有证据证明康生策划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不仅如此，根据王力回忆，康生对聂元梓的看法很不好，常在中央文革小组讲聂元梓的坏话。应当客观地说，康生、曹轶欧促进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问世并且支持了它，但不曾策划或者指使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

毛泽东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也是决定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命运和历史作用的人。北京大学对全国文化和政治具有传统的影响，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示范作用，是非同一般的。毛泽东深知这一点，他盛赞大字报的真正动机，是把它当作发动群众运动的重要步骤。聂元梓等人写大字报是针对北大党委书记陆平等人的，至于大字报贴出以后造成全国性的影响，成为“天下大乱”的起点，从根本上说，是由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战略决定的，是作者们始料不及的。

基层矛盾的激化、康生等文革派人物的推动、毛泽东的政治需要和决策，是北大第一张大字报出世的三步曲，也是文化大革命中常见的群众性样板产生的模式。

最后应当说明，本文是依据现有资料，特别是口述资料，对有关历史事实的初步考察，相信随着档案文献的公开以及资料的丰富，事实会得到进一步澄清。

□ 香港《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六年八月号·第三十六期

<http://www.cuhk.edu.hk/ics/21c>

~~~~~

【四海翻腾】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or [back to TOC](#)

我在台湾所体验的文革

• 陈映真 •

（陈映真，原名陈永美，台湾知名作家和评论家，曾在六七十年代因“思想问题”入狱。著名作品有《将军族》、《夜行货车》、《山路》、《赵南栋》等。）

我二十一岁时的一九五八年，在台北市牯岭街旧书摊上寻找中国三十年代文学作品之余，极其偶然地接触了三十年代的社会科学书，改变了半生命运。《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教程》、《联共党史》、《马列选集》（莫斯科外语出版社，第一卷）、《中国的红星》（即《西行漫记》日文本），抗战期间出版的毛泽东论文小册子（如《论持久战》、《论人民民主专政》）乃至六十年代初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日译本），完全改变我对于人、对于生活、对于历史的



视野。

大学毕业不久的一九六三年，中苏共之间爆发了大规模的理论论争。而中共竟把这理论斗争诉诸大陆全民。将针锋相对往返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的、严肃而决不易读的论文，一日数次透过电台广播。而在台湾的我则必一日数次躲在闷热的被窝里偷偷地、仔细地收听这些把中苏共理论龟裂公诸于世的、于我为惊天动地的论争。

在论争中，中共对苏共分析苏联国家和苏联党为“全民国家”和“全民党”，提出尖锐的批判，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在向着共产主义过渡的全过程中，仍然存在着阶级，也就仍然有阶级斗争。当一九六六年大陆再次以惊人的形式宣告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登场，我便自然地以“九评”中提起的持续革命论和反修正主义的观点，去理解这史无前例的运动了。

我的诧异的眼光，看到文革的火炬在全世界引发了激动的回应。在东京大学，学生占据系办公室，批判权威教授，要求教育革命；在法国，“巴黎五月”使戴高乐下台，开展了新的思想运动；在美国，民歌复兴运动、言论自由运动、反越战运动、反种族歧视运动……风起云涌。我读着题为《公社国家之成立》的日语论文，论证着中国的文革如何体现了巴黎公社运动中工人起而建造阶级的国家政权的传统，宣说“一个新的人类、新的文明、新的国家政权正在中国的地平线上升起……”而心怀激动。

于是，在一九六八年，我怀着这文革的激动被捕，接受拷讯、走进了黑牢。

但这一段属于我私人生活历程中的文革，并没有在我投狱后对我宣布其结束。

#### ◇ 两岸分断使历史脱臼

一九六九年底，我被移送到台东县泰源监狱。七零年初，即使从开着“天窗”的报纸，我们也敏锐地感觉到囚壁外的世界在急速地变化。我知道了保钓爱国运动和它的左右分裂与斗争；我更知道了保钓左翼思潮在岛内引发了一场“现代诗论争”。

一九七五年我出狱回家，着手搜集关于保钓和文革的文献，看到了两岸分断所造成的历史的脱臼。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政。经历了十七年的建设和探索，实务派的干部对于进一步发展经济、稳定现有秩序，有迫切的要求。但以毛泽东为中心的政团，则忧心开发主义背后的资本主义性质，忧心要求稳定和秩序背后的官僚主义、封建主义和党群关系的剥离、工农同盟的弱体化……。这是一场对待革命后的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时，是要向右改革（实务派）还是向左改革（毛派）的大争论。

然而，来自白色的港台、在保钓运动前基本上对中国革命一无所知、甚或保持偏见的保钓左派留学生，却在短短几年保钓运动中辛勤而激动地补了大量的课，不少人经历了触及灵魂深处的转变。他们从一个丢失祖国的人变成一个重新认识而且重新寻着了祖国的人。他们更换了全套关于人、关于人生、关于生活和历史的价值和观点。有不少人为此付出了工作、学位甚至家庭的代价，却至今无悔。祖国的分断使历史脱臼，运动则使历史初初愈合。

四九年底到五三年的反共恐怖肃清，使日帝下殖民地台湾艰难发展的民族解放论的传统为之毁灭。这毁灭绝不只是残酷的屠杀，而是一代民族 / 民主运动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哲学、社会科学和审美（文学艺术）这些体系的正统和传统在台湾的

灭绝。一九五零年以后，正是在这肃清的血腥的空白上，移入了美国“自由主义”、“民主”、“资本主义”、“反共”……这些冷战的意识形态，一直到今天，成为战后台湾的主流思潮。

#### ◇ 保钓打开思想空间

然而，几年整整一个七十年代，保钓运动却奇迹一般地打开了一块反主流、反冷战的思潮的空间——现代诗批判、学术中国化运动和乡土文学论争。在冷战与内战交织的白茫茫的荒野上，提出了关心工农、反对帝国主义、民众文学、民族文学、文学艺术的民族性和阶级性、台湾经济的殖民地性……这些尖锐的口号。

然而，没有保钓左派，就没有这一段“脱冷战”的思想运动；而没有中国大陆的文革，就没有保钓左翼——也就没有七十年代的现代诗批判，没有学术中国化运动，更没有著名的乡土文学运动。

#### ◇ 全盘否定文革失于轻薄

文革结束之后不久，大陆主流的文革认知是对文革的全面否定。然而，文革结束后二十年的今日，据说在海外年轻一代大陆留学生中正在发展新的文革研究，对“全盘否定”的主流论说，提出深刻的质疑。如果历史把文革的实体之研究交给文革结束前几年才出生的一代，那么，即使不曾直接经历过文革的台湾的年轻一代，大可不必因没有直接、间接的文革体验而谦让研究和建构文革论的大义名份吧。

文革是一段复杂的万端的历史。三十年后的今天，要搞全盘肯定文革势必和搞全盘否定文革一样不能不失于轻薄。例如在“开放改革”中没有得到好处的广大的人们，今日重读毛泽东在文革期间主张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持续性存在、反对官僚主义和封建主义、党里面存在着“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旧社会的文化、思想、习惯正在复活……这些言论，仍然会激起很深的共鸣。

八十年代后期，随着苏联和东欧的解体而宣告结束的冷战，使美国成为单极独霸的霸权，而“意识形态的终结、‘自由’、‘民主’、私人企业、无尽的经济繁荣……宣告了最后的历史性胜利——而共产主义运动终于宣告彻底的失败”的说法，也成了世界性主流的论述。这些说法，透过西方常春藤精英校园的讲坛，通过西方强大的大众传播不断地再生产，也通过全球化的资本循环运动，终至全面湮灭、歪曲和否定广泛殖民地／半殖民地百年来民族解放运动中追求人和民族终极之解放、和平与进步的思潮，以及这思潮的正当性与正统性。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阶级和人民的真实的自由与解放运动，被全面漫画化，受尽毁谤和嘲笑。而做为这民族解放运动史中重要环节的、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更难于不受尽谤渎和嘲谑了。

然而历史的现实是，这文革非但翻动过中华万里江山、神州大地，也曾越过封锁的海峡，强大地影响了台湾，在战后反共／冷战思潮全面支配五十多年的历史的冰天雪地里，撞开七十年代整整十年思想上的脱冷战时期，踵继了从四六年到五二年以在台的中共地下党为中心的民族／民主运动的传统，并且具体地引发了“现代诗论战”和“乡土文学论战”等重要的思想运动。

今日台湾各大专院校学生社中的“慈幼社”、“山地社”、“大陆问题研究社”和社会问题调查活动，追根溯源，其实是岛内七零年保钓的遗物，是保钓激发学生关心社会的“百万小时服务”、“上山下乡”运动遗留下的化石。

这是近来极力主张台湾与大陆早已殊途两端，各不相涉的“学者”和先生们所难以认识的了。

今天，我们民族积累的运动，看来在海峡两岸正积累着不少复杂而严重的问题。官僚主义、官商资产阶级的兴起、直接生产者的政治和社会权力遭到侵夺、外来资本和势力的逻辑左右着我们发展的形式与目标、腐朽的思想、文化、习惯和行为，深刻浸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在这样的历史时代，对文革进行科学的再思，对祖国两岸应该都有重要的意义吧。

□ 原载《亚洲周刊》一九九六年五月二十六日

---

Now go to [the previous Zeng Kan issue](#)  
or go back to [the TOC of this issue](#)  
or go to [the next Zeng Kan issue](#)  
or go to [the index of all available issues](#)  
or go to [the end of this last column](#)

---

本期责任编辑：[华新民（美国）<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本期 校对：[吴 放（美国）<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读者技术咨询：[徐明扬（澳大利亚）<cnd-help@cnd.org>](mailto:cnd-help@cnd.org)  
网络技术维护：[熊 波（美国）<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何 为（美国）<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主编：[李彤彬（美国）<cnd-cord@cnd.org>](mailto:cnd-cord@cnd.org)  
《CND》总编：[熊 波（美国）<cnd-manager@cnd.org>](mailto:cnd-manager@cnd.org)  
>

---

订阅（或停订）《华夏文摘》请寄：[LISTSERV@UGA.UGA.EDU](mailto:LISTSERV@UGA.UGA.EDU)（GB版）  
并请注明：SUB （或 SIGNOFF）CCMAN-L FIRST LASTname  
或寄：[LISTSERV@BROWNV.M.BROWN.EDU](mailto:LISTSERV@BROWNV.M.BROWN.EDU)（HZ版）  
并请注明：SUB （或 SIGNOFF）CNDBRU-L FIRST LASTname  
停订命令不必加 FIRST LASTname

---

其他获取或阅读《华夏文摘》的途径：  
无记名文件存取（FTP）：[canada.cnd.org](http://canada.cnd.org)[142.132.12.100]：pub/cnd/hxwz  
万维网服务站（WWW）：<http://www.cnd.org/HXWZ>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